

万载客家人的迁徙路径

文/徐小明

唐中叶以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开发,从赣中北或其他地域迁入赣中南、赣西南的汉移民,因血缘混化、文化融合,形成了闽粤赣三地各族姓居民之间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历数百年,至宋末元代,三省交界地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民系——客家。明清之交,万载与江西其他地域农村一样,因战事而百业凋敝,大量田地抛荒,急待复垦。此时,又因闽粤移民客家人口过快增长,“生齿日繁,人众业少”。为避倭寇之乱,不堪兵火蹂躏,闽粤民众或自由流离邻疆,或应召相继入赣。

明嘉靖三年(1524年)后,闽粤部分无业客家之民开始相继流寓于万载,他们凿山种麻,春来冬归。清顺治年间,明末遗将据守闽粤沿海一隅,反复争战,旷日持久。为了绝其后援,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下令将闽粤沿海居民迁入内地。是时,赣湘边沿山地,人烟寥绝,自需移民垦殖。万载因岭多山广,由此迁入甚多。

在清朝,据光绪31年(1905年)万载《邱氏客家谱》记载,于吉原籍赣州府信丰县龙泉乡之樟里,康熙42年(1703年),公祖父同志远徙,不惮千里,而来袁郡万邑。据万载潭溪谢氏族谱载,潭溪谢氏之先,或居嘉应州平远,或居赣南长宁,至11世光字派20余人,均有12、13、14世后裔由平远、长宁等地迁入万载。再如万载籍开国中将杜平家族,其始迁祖均由赣州长宁等地转迁入。据万邑武家坊光绪15年(1889年)《韩氏荣公支谱》载,万载韩氏原居粤东北程乡,明初迁居赣南长宁、满坑,康熙年间其后裔宥有、绍有、纯有等迁入万载与萍乡等地。

高村《张氏大成谱》载,品玉公于康熙壬戌(1682年)同侄明九、科一徙虔州兴国置产居住……买屋场一处,禾田七顷,茶头荒山畲岗等业。居15载,犹未惬意,遂将是业遗侄……适袁郡万邑。据《温氏族谱》记载,万载的温氏客家人,一支是清康熙年间仕崇公携家眷由福建上杭迁居潭埠九水冲(今芳林境内),后散居黄茅、袁州等地;另一支是清康熙年间桢贤公桢德公等七兄弟携家眷由广东嘉应州迁鹤峰石狮(今县煤矿附

近),后散居布塘、虎塘、范塘及袁州的彬江、园岭、峰顶山等地……

也有依附亲族再次转迁来万载的客家,据高村《吴氏族谱》载,康熙38年(1699年)二十一世由兴宁鸡婆塘迁长沙善化,停居三年,壬午年(1702年)徙袁州、万载黄茅等地。二十二世由粤东惠州府连平州忠信怀陂而来,择(万邑)清溪叶家洲焉。二十一世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由兴宁迁入万邑。由此可见,同一客家吴氏,来万载的路线有的直接,有的迂回。

受闽粤赣交界地居民多有迁入西南诸省的影响,仅清朝迁入赣南或由赣南转徙万载的闽粤移民客家,有曾、彭、谢、黄、叶、刘、徐、韩等20余个姓氏,共有484个村,各社场均有分布。从南部岭东经白良到东北罗城一线,包括县城在内的东南一隅相对较少,大都在3至8个村,仅南部高城有38个村。其他社场大部分密集,如北部高村有59个村,中部茭湖有59个村,西南潭埠有46个村,西部仙源有47个村,白水有46个村,占各社的半数或四分之三。还有万载西北部的西坑和官元山等地,几乎全是客家人。

明清时持续进入万载的闽粤赣移民客家,是其时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产物。他们多以结棚而处,凿山种麻,春来冬归,于是史称“棚民”。当时人数不多,后因多次迁入或繁衍,人口增至二三十万。

“棚民”向山主租山后,人无闲民,地无遗利。玉米、红薯是耕山客家可靠的主食之源。“闽粤来此耕山者,携其泛海所得之苗种之”,他们或“朝夕裹腹多苞粟”,或“经岁不米炊,习以为常”。他们同时进行油茶、油桐、漆树等经济林的培育,在客观上促进了山区的开发和经济的繁荣。这也是客家扎根山区,致力于商品性农业生产,成为维系山区客家经济的重要前提。

后来,棚民或购置庄屋,或另辟房舍,逐渐携妻小定居;“占美田宅,与土著争富”。雍正二年(1724年),据地方官员调查,定居于万载的客家人,大都“或种靛麻,或种茶烟,或佃耕做纸”为生计。他们徒手起家,骤拥雄

资,渐渐涌现许多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辏不下万金”。

康熙年间,万载为规避客家与土著争富,开始驱逐棚民,禁止给“棚民”立户籍图册,致使万载不少客家人被迫到邻县避难。据《赣文化研究》第10期万芳珍《赣南在客家产生中的双重角色》及其《客家移垦原由》等文记述,湖南醴陵客家多有万载棚民“散居县境,久乃立籍”。明清时,万载转村477个,其中迁入袁郡慈化、峰顶山、金瑞三社有141个,转迁宜丰89个,转迁高安、分宜等地若干。他们暂居或定居一段时间后,全家或部分族人再迁西南诸省。据民国10年(1921年)昭萍《萧氏族谱》记载,清初,后裔有彭公避康熙兵燹,从于都迁万载获富,耕读数载,再迁萍北洲田口与田头等地,雍正年间入籍萍邑安平里二图二甲。

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谢宏维《清代棚民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所述,生活富足的棚民渐渐在利益方面与土著发生冲突,倚仗宗族组织与势力的发达,或结党逞凶,或纠伙肆祸。从明清交替时期至民国后期的200多年间,万载客家已繁衍日盛。他们纷纷聚族而居,均立祠堂以尊祖报本。

据1987年《万载县志》记载,直至雍正2年(1724年),万载才将这些迁来的棚民入籍造册,并设客都、客图、客保区别之。

为了化解“土客”界限,土地革命时期,万载县苏维埃政府在颁布的《政纲》中,明确规定必须“彻底打破‘土客’界限”。1936年,县政府明令打破城居藩篱,土著与客家才互通婚姻,同修县志,合办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多方面工作才消除“土客”分歧。

客家是在漫长岁月里,筚路蓝缕,不断融合当地原住民而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大民系。客家人在不断迁徙中不断地适应、融合当地文化,又不断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客家人坚韧不屈、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品质,与山川同心,与日月同辉。

台北故宫寓莲于瓷的绝世珍品

文/秦延安



世人甚爱莲花,不仅欣赏它“天然去雕饰”的高雅姿态,更仰慕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

格。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便是这样一件寓莲于瓷的珍品。

“天下瓷器,汝窑为魁。”作为汝窑瓷器中唯一一件传世的莲花式温碗,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可谓是绝品中的精品。该碗呈规则的莲花形,直口稍敛,口缘十个花瓣如飞起的浪花朝向天空,线条自然,流畅贯连,形似一朵绽放的莲花。俯看又如十曲花瓣,格外传神。碗腹壁外鼓,上丰下敛,且深,稍呈圆弧,随花口亦呈十瓣,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

汝窑瓷器以天青色最佳。纵观该碗,有青如玉、面如玉、晨星稀的汝瓷典型特征。这种明丽而澄净的天青实际上是复合色,它里面包含了深浅明暗等各种变化,会随光变幻,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有似玉非玉而胜玉之艺术美,可谓是精美绝伦。

关于其由来,还有个传说。据传,宋徽宗曾做梦,雨

后天天空成天青色。醒来后,他发誓要烧制出这样美丽颜色的瓷器。于是,天下窑匠争先恐后进行尝试,最后汝州窑匠技高一筹,烧出了天青色的汝瓷。

宋朝诗人王迈在《莲花》诗中写道:“莲花出自淤泥中,过眼嫣然色即空。争似泥涂隐君子,褐衣怀玉古人风。”“莲”通“廉”,受宋人所追崇,为了表现其向莲而生的志向,于是,便有了这件莲花式温碗。

温碗是盛行于晚唐至宋代的温酒器具,一般和执壶配套使用,注入温水,可保持壶中液体的温度不易散失,只可惜现在只有碗而不见壶了。

汝窑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如昙花一现般,只烧造了二十余年,它以泥土为母以火焰为父,在天青的炸裂中绽放出美丽。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这样独具风采的瓷器,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汝窑工匠高雅素净的审美观和精湛绝伦的技艺,还有灿烂的宋瓷文化。